

陈高华 著

# 思考与判断

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政治之思

汉娜·阿伦特及其思想，自《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问世以来，就一直受到政治哲学研究者的关注。从她一生的运思历程来看，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活跃在她的全部著作之中。本文以思考和判断为中心概念，阐述阿伦特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高华 著

# 思考与判断

汉娜·阿伦特的哲学——政治之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考与判断: 汉娜·阿伦特的哲学 - 政治之思 / 陈  
高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161 - 0043 - 1

I. ①思… II. ①陈… III. ①阿伦特, H. (1906 ~  
1975) - 政治哲学 - 研究 IV. ①B712. 59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7783 号

责任编辑 郎丰君

责任校对 马海燕

封面设计 郡 婷

技术编辑 戴 宽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导言.....	1
1、不入“流”的思想家 / 1	
2、国内外研究简评 / 10	
3、阿伦特哲学——政治问题的缘起 / 15	
<b>一、非本真的政治哲学：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源流及其批判.....</b>	<b>21</b>
1、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源流 / 21	
(1) 前柏拉图时期 / 22	
(2) 柏拉图时期 / 25	
(3) 后柏拉图时期 / 32	
2、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批判 / 41	
3、何为政治：行动、自由与公共领域 / 51	
(1) 政治与行动 / 52	
(2) 政治与自由 / 57	
(3) 政治与公共领域 / 60	
<b>二、思考：从哲学到政治.....</b>	<b>65</b>
1、哲学与意义的追寻 / 66	
(1) Thaumazein 与好奇 / 68	
(2) 意义与真理 / 77	
(3) 理性（思考）与知性（认知） / 82	
2、思考及其政治意义 / 86	
(1) 思考素描 / 88	
(2) 苏格拉底：思考的政治意义 / 96	

(3) 意识形态：思考与行动直接相连的危险 / 104

三、判断：在哲学与政治之间 ..... 111

1、判断：两种模式 / 113

(1) 行动者中心的判断 / 114

(2) 旁观者中心的判断 / 118

(3) 一个小结 / 122

2、政治判断：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 / 124

(1)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 / 124

(2) 康德的审美判断 / 127

(3) 判断的政治意义：世界意识的确立 / 135

结语 现代性中的哲学与政治 ..... 139

附录 “还剩下什么？只剩下语言”

与君特·高斯的一个谈话 ..... 145

参考文献 ..... 167

后记 ..... 179

# 导 言

## 1、不入“流”的思想家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及其思想，自《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问世以来，在西方就一直受到政治哲学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甚至认为，她的著作在某些方面引导了20世纪的政治哲学研究，由此可见阿伦特在政治哲学史上的地位。尤其在她死后，关于阿伦特及其思想的研究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片浪潮，美国学界甚至出现了“阿伦特研究”（Arendt Studies）<sup>①</sup> 这样的一个名词，而对阿伦特进行研究的学者则被称作“阿伦特派”（Arendtian）。如此盛景，难怪有人誉为“阿伦特研究复兴”（Arendt renaissance）。随着阿伦特捐赠给美国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的私人手稿通过网站得到公开，这一盛况在西方显得日益壮观，呈现了活跃的阿伦特研究景象。<sup>②</sup>

与西方的阿伦特研究盛况相比，国内的阿伦特研究则显得零散薄弱。20世纪80年代中期，甘阳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译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由此发端了历久不衰的海德格尔热。阿伦特这个名字，在那个时候也随之进入了海德格尔研究者的视野。然而，20年过去了，当人们有意无意地提及阿伦特时，几乎脱口而出的依然是这样的言说：“阿伦特，海德格尔的情人和学生，”或者还会补充说，“我也挺喜欢阿伦特。”由此可见，尽管阿伦特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和大

---

① 类似于研究罗尔斯（John Rawls）及其思想的所谓罗尔斯产业（Rawlsian industry）。

② 关于西方的阿伦特研究的简洁得当的介绍，参见莫大华，“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政治思想的特色与省思”，载《复兴岗学报》，第82期；阿伦特手稿在国会图书馆的网址：<http://memory.loc.gov/ammem/arendhtml/arendthome.html>；另，“鄂兰”为台湾学者对Arendt的译名。

众所知,但她依然没有真正进入学者们的“研究”<sup>①</sup>视野,人们常常只是津津乐道于她与海德格尔的一段情事。情事当然是一个事实,甚至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实,而且谈论这一情事也并非噱头,里面确实纠缠着思想的事情。然而,过多地在这一情事上,尤其是在一种作为海德格尔研究的辅助层次上滞留,对于阿伦特思想的研究而言,则显然是舍本求末。由此,既错过了“名满天下的阿伦特”<sup>②</sup>,也遮蔽了她的思想光芒。

不过,不管是日益活跃的西方阿伦特研究,还是依然零散薄弱的国内阿伦特研究,都没能给阿伦特确定一个适当的位置,或许对于阿伦特来说,这样的一个位置本身就是不可能。因为,“阿伦特的著作无论在方法和内容上都是极其独特的,迥然不同于习见的理论分类。”<sup>③</sup>据说,海德格尔那“唯一的弟弟”有一句口头禅——“你可以不正眼看我,但你无论如何不能一眼看透我。”<sup>④</sup>这句话也完全适合于阿伦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人们可以置阿伦特及其思想于不顾,但阿伦特及其思想绝不是可以被简单加以概括的。1972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行了一个关于阿伦特思想的会议,其时阿伦特本人也到场,并与著名的政治学家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有如下一段对话:

摩根索:你是什么人?你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当代的种种可能性中你的位置何在?

阿伦特: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而且从来就没有知道过。我想我从未有那样一个位置。你知道的,左派

① 据笔者所知,中文世界出版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研究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专著,是台湾学者蔡英文的《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此前已在台湾发行;另外,笔者还见到以阿伦特思想为题的两篇博士论文,分别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潘非欧的《思与公共领域的重建——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探要》(2004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陈伟的《政治、政治世界与新政治学——汉娜·阿伦特的政治观》(2005年);至于其他少量的研究文献,以及阿伦特著作的翻译情况,笔者会在后面作简单介绍,之后在文末以参考文献的形式列出。

② 陈嘉映,“纠缠与疏朗——海德格尔的阿伦特牵连与纳粹牵连”,《开放时代》,2000年第7期。

③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主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④ 参见[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来自德国的大师》,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18页。

认为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保守主义者有时则认为我是一个左派或持异见者，天知道是什么。但我必须说，我不关心这些。我也不相信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对这个世纪的真正问题有所澄清。<sup>①</sup>

上述的发问不仅仅是摩根索的疑问，而且是一个代表了几乎所有阅读阿伦特著作的研究者的疑问。对于生活在“规则手册”满天飞的环境中、已然习惯于意识形态（Ideology）思考方式的人而言，若无法给一个思想家“扣上一顶帽子”或者划入某个派别，那么这个思想家就是不可理解的。然而，对于强调“重要的是去理解”<sup>②</sup>的阿伦特而言，这一“不可理解”恰恰表明了人们判断力的弱化，更确切地说，是康德（Immanuel Kant）意义上的“反思判断力”的弱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对于思想和生活越来越失去其明确性，以至于到了若没有固定的“规范”就不知道该如何判断的地步，就是一个明证。

因此，一直无法纳入西方政治思想之“流”的阿伦特，常常被误解或被认为不值得一提。在当下中国学界大行其道的所谓思想史家伯林（Isaiah Berlin）就曾在一次对谈中表达了他对于阿伦特的轻蔑，他说，“我承认我非常不尊重这位女士的观点。许多著名人士推崇她的著作。我不欣赏……她没有形成任何观点，也没有迹象显示她有什么严肃的哲学或历史思想。她写东西全是乱七八糟的形而上学大杂烩，甚至句与句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关联，也没有合乎理性的或可以想象的联系。”而阿伦特曾经的朋友、犹太学者索勒姆（Gershom Scholem）断言，“任何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和严肃认真的思想家都不会与她为伍。”<sup>③</sup> 这些评论无疑显示了评论者本身的肤

<sup>①</sup> Richard J. Bernstein, *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6, p. 3.

<sup>②</sup> Hannah Arendt, “‘What Remains? The Language Remains’: 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edited by Jerome Kohn, New York, San Diego, London: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 pp. 1—23.

<sup>③</sup> Seyla Benhabib, *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Publisher, 1996, xxxvii, note 6; 中译文参见，[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桢钦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9页。



浅和庸俗,而这都发生在阿伦特报道了关于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以及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个关于恶的庸常性的报道》(*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之后不久,更加表明这两位犹太学者对阿伦特的评论带上了过多的情绪色彩。正如阿伦特研究的著名学者本哈碧(Seyla Benhabib)所言,“伯林对阿伦特的不屑一顾,让人们一再想起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们这一代欧洲流亡者典型的怀恨在心的抵触、不和以及个人仇恨”。<sup>①</sup> 尽管如此,稍有学术识见的人都会觉得,不管是稍有名气的索勒姆还是大有名气的伯林,就思想的原创性而言,都比不上不入“流”的阿伦特。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真正的创造决定性地存在于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所谓的“范式”之外。在一定范式下进行的是“工作”,而唯有在范式之外进行的、为范式无法解释的反常,才是“行动”;而唯有“行动”才是自由的、创造性的。阿伦特生逢的20世纪恰恰是一个“反常”的世纪,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其中发生的政治事件、出现的政治现象无法用西方政治思想主流中的各种范式去理解。对于这一点,对阿伦特表示轻蔑的伯林也说:“我的一生历经20世纪,不曾遭逢个人苦难。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却是西方历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sup>②</sup>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曲解和批评,阿伦特依然日益被人们认为是20世纪最令人激动和最具原创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她的政治思想也日益吸引着更多的学人去研究探析。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帕勒克(Bhikhu Parekh)教授颇为中肯地指出,无论人们对于阿伦特作出什么样的判断评价,她依然是一位值得认真细致探究的创造性思想家。他把阿伦特的独特性归结为以下几点:她是少有的几位以纳粹极权主义为背景对政治进行系统哲学思考的政治哲学家之一,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伦特此后的一切政治思考都渗透着她遭逢的纳粹经历;她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把整个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贬斥为“非本真的”,因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家;她是第一位在英语世界把现象学方法应用于对政治的理解的政治哲学家;她是

<sup>①</sup> Seyla Benhabib, *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Publisher, 1996, xxxvii, note 6.

<sup>②</sup> [英]埃里克·J.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政治哲学史上把政治看成是一种审美活动的第一人；她是唯一一位提出了一种政治的世界观（political Weltanschauung）的政治哲学家；她是一种以公共的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新文化的一位有力倡导者；当然，她还是除了同时代的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薇依（Simone Weil）之外，思想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政治哲学家。<sup>①</sup> 这最后一个提法或许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但这是 20 世纪以来的一个“小小的女性哲学家传统”。<sup>②</sup> 此外，阿伦特对于“出生”（Nativity）概念的重视和强调，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是一种对柏拉图（Plato）以来的哲学传统的反叛。众所周知，自柏拉图以来，对于“死亡”的思考是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甚至哲学被认为就是学习如何处于死的状态。而且，阿伦特的老师海德格尔也依然强调对“死亡”思考的重要性，认为正是在对于“死亡”的思考中才能回到“本真的存在”，是所谓“向死而生”。针对海德格尔的此在向死亡敞开的思考，阿伦特则提出或补充了出生哲学，表达了对于“开端”之开创能力的推崇，而这也一直是海德格尔所推崇的地方。如果说“死亡”是消除一切可能性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在阿伦特看来，“出生”就是开始一切可能性的可能性。

或许我们应该把这种分门别类的做法放在一边，因为不管是阿伦特的生活经历，还是她所思考的领域，如同整个 20 世纪的政治事件一样，都是极其复杂的。“在我们这个世纪，就一个政治思想家的生平对于理解其思想的至关重要性而言，显然没有谁能够把这一点表现得比她更为真实，也没有哪个政治思想家比她更好地反映着这个世纪的政治史。”<sup>③</sup> 然而，阿伦特并非一开始就关注政治或政治现象，认真说来，关注政治对阿伦特来说是迫不得已的“不得不”。

阿伦特 1906 年出生于德国的汉诺威，在康德的故乡哥尼斯贝格长大，14 岁开始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由此，她踏上了哲学这一冒险的乐土。而对于康德的阅读和汲取，则贯穿于阿伦特一生的运思历程。我们发现，阿伦特在其思考过程中不断地从康德出发又回到康德。她计划中最

---

<sup>①</sup> 参见 Bhikhu Parekh, *Hannah Arendt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Political Philosophy*, prefac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

<sup>②</sup> 语出崔卫平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日”（2004 年 11 月 18 日）之“女性和哲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sup>③</sup> [英] 迈克尔·H. 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79 页。

后一部著作的最后一卷则是直接得自康德的启明，尽管我们只能看到这一卷的未完成形式。康德之于阿伦特的重要性，我们从她的一段话中就可以得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一坐下来写作，就觉得康德站在身后看着我。”<sup>①</sup> 在通过康德踏上哲学路途之后，她随后熟练地掌握了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从学于当时德国最有思想的头脑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她从未表现出对于政治的任何兴趣。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至 30 年代初，阿伦特跟随海德格尔学习，听胡塞尔（Edmund Husserl）讲课，并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撰写了博士论文。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哲学的教育背景，而且这一教育经历也奠定了她一生的思考视阈，可以说这是阿伦特在思想上的转折点。

与此同时，对阿伦特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事件也日益明朗，那就是纳粹逐渐掌握了政权。希特勒的上台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阿伦特之前从不关注的政治进入了她的视野，成为她作为一个“犹太人”不得不去关注的问题。她在一次访谈中说道，1933 年的国会大厦纵火案“对我来说，是一个直接的震惊，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不关心政治已经不可能。”<sup>②</sup> 她对纳粹这种后来她称为极权主义的特有的政治现象的思考，最后汇集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可以说，阿伦特“是第一个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索极权主义起源，并对之作出完备的概念思考的思想家”<sup>③</sup>。正是凭借这一著作，阿伦特在西方政治思想界崭露头角甚至由此奠定了她政治思想家的地位。在这一著作中，阿伦特探讨了极权主义这一现代特有的政治现象的历史条件和结构因素，认为极权主义是为扩张而扩张、民族国家的衰落、种族主义、资本和暴徒的联合、反犹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但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历史研究，即不是单纯地分析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去揭示极权主义的政治蕴含，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政治现代性的危机，它同时也表明了西方

① *Hannah Arendt: Twenty Years Later*, edited by Larry May and Jerome Koh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The MIT Press, 1996. p. 1.

② Hannah Arendt, “‘What Remains? The Language Remains’: 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edited by Jerome Kohn, New York, San Diego, London: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 pp. 4—5.

③ 王音力：《鄂兰》，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2 年版，第 2 页。

文明及其价值体系的危机。而且，诚如英国著名的阿伦特专家卡诺范（Margaret Canovan）指出的那样，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分析思考，决定性地规定了她之后的运思路程。<sup>①</sup> 不过，“《极权主义的起源》对‘我们世纪的危机’的分析基本是在政治阶级社会的层面，类似马克思的帝国主义分析，未涉及深层的思想和形而上的原因。”<sup>②</sup> 而这恰恰就是由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思考所决定却又未思及的领域。因此，阿伦特之后写成了较多重要并影响广泛的著作，其中包括1958年出版的《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和1962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个关于恶的庸常性的报道》。前者可以说是阿伦特第一部较具体系性的政治哲学著作，这一著作的主题是考量“我们正在做什么”。由此，她提出了著名的“行动理论”，强调是一个个的人，而不是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因而，每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积极行动，才能使人获得意义。这一立场倒转了西方哲学几千年推崇“沉思”的传统。书中阐发的“激进民主”的理念以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观点，则激励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后者则是最为引起争议的一部著作，是她作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特派记者前往耶路撒冷报道对于艾希曼的审判的产物。她根据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表现以及对有关卷宗的阅读，发现艾希曼极其肤浅，根本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本性邪恶之人。由此，阿伦特提出了“恶的庸常性”（*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一观点，认为艾希曼之所以犯下如此罪行，完全是因为“思考的缺乏”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做判断。同时，阿伦特在书中还指出她的犹太同胞在面对纳粹的政治邪恶的迫害时，不但没有抵抗，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与纳粹形成了共谋。因此，此书一发表就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遭到了她的犹太同胞的谴责，甚至她的一些朋友因此而与其决裂，索勒姆就是其中一位。当索勒姆写信质问她是否拥有对于犹太民族的忠诚和对于犹太人的爱时，阿伦特回信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爱过’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集体——德国、法国或者美国，工人阶

<sup>①</sup> 参见 Margaret Canovan, *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sup>②</sup> 张汝伦，“极权主义与政治现代性——读《极权主义的起源》”，《现代哲学》2005年第4期。

级或者任何曾经存在过的团体。事实上我只爱我的朋友，而完全无法拥有其他任何一种爱。”<sup>①</sup>当然，阿伦特从未否认她的犹太身份，而且坚持一种“自觉贱民”的身份；她说，“如果一个人是作为一个犹太人而受到攻击，那么他就必须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来为自己辩护。”<sup>②</sup>阿伦特以此与她生来所属的团体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团体都保持一定的距离，由此保持自我反思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在中国学界未受重视的哲学家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的一句话——“国籍和宗教……与我们的道德本质过于盘根错节，难以体面地改变，而对于自由不羁的人而言，它们又是偶然之物，不值得变更。”<sup>③</sup>毫无疑问，阿伦特属于“自由不羁”之人，并且把这种自由转换成一种“不用扶手的思考”。阿伦特自称，她之所以审视“思考”，其中一个动机就在于从艾希曼的身上所看到的“思考的缺乏”所导致的罪恶。不过，就阿伦特本身的整个运思历程来看，对于“艾希曼审判”这一事件的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转折点。如果说纳粹主义的兴起和希特勒的掌权使她不得不转向对于政治的关注的话，那么艾希曼的审判事件则又使她回到了她最初倾心的哲学领域，尽管在经历了20世纪最为恐怖的政治现象之后，阿伦特对于哲学的看法已非当初那样单纯的崇敬了。正如台湾学者蔡英文所言：“这个事件的争议带动阿伦特从思考实践活动意义而走进探索人之思考、意愿与判断活动的哲学课题。”<sup>④</sup>对于这些领域的研究，构成了《心灵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一书。正如这一著作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其主题探讨的是心灵的生活，这恰与阿伦特之前的《人的境况》一书的主题——对 *Vita Activa*（积极生活）的探析——形成对照。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心灵生活或者说 *Vita Contemplativa*（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和连续性，并且潜在地规定了阿伦特在完成《人的境况》一书之后对心灵生活这一主题的探讨。因

① Gershom Scholem: *A Life in Letters, 1914 - 1982*,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nthony David Skinn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99.

② Hannah Arendt, “‘What Remains? The Language Remains’: 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edited by Jerome Kohn, New York, San Diego, London: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 p. 12.

③ [西班牙] 乔治·桑塔耶纳：《英伦独语》，邱艺鸿、萧萍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页。

④ 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为，她的《人的境况》一书是以加图（Cato）的一句箴言结束，而这句箴言又被她置于《心灵生活》的开头。加图的这句箴言就是：“一个人从不比他什么也没做时更多积极，也从不比他独处时更少孤独。”（Numquam se plus agree quam nihil cum ageret, numquam minus solum esse quam cum solus esset.）<sup>①</sup> 其中对于沉思生活或心灵生活的性质的关注跃然纸上，并且暗含着积极生活与沉思生活之间共通的可能性。<sup>②</sup> 1975年，阿伦特在寓所突然离世，留下了未完成的《心灵生活》，一生的运思历程戛然而止。未完成的《心灵生活》后来由好友麦卡锡（Mary McCarthy）整理于1978年出版，其中只完整论述了“思考”与“意愿”两个部分，关于“判断”的部分只留下一些讲座的草稿，后来英国学者贝勒尔（Ronald Beiner）对其进行了整理，以《康德政治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为题出版。

从以上对于阿伦特的运思历程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的运思之途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到政治再回到哲学的过程。当然，阿伦特这一哲学——政治——哲学的运思历程，包含了她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广泛的思考论域。在这诸多思考论域当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同时也让她难以释怀的主题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就是她的两本重要的著作《人的境况》和《心灵生活》所探讨的主题——积极生活与沉思生活——之间的关系。当然，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几乎贯穿她所有的著作。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人的境况》和《心灵生活》之外，《在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和《黑暗时代的人们》（*Men in Dark Times*）这两本文集也直接处理这一主题。本文力图以这些著作作为中心，贯穿阿伦特一生的运思历程及相关著作，剖析阿伦特关于哲学——政治的思考，揭示她一步步深入面对这一纠缠不清的问题的思考。然而，阿伦特是

<sup>①</sup>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 325; 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New York, San Diego, London: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

<sup>②</sup> 实际上，“人的境况”这一出版商所确定的书名对于《人的境况》一书而言并不完全确切，因为《人的境况》一书只探讨了“人的境况”的部分，即 *vita activa*（积极生活），而“人的境况”理当包括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 *vita contemplativa*（沉思生活）。另外，*vita activa*（积极生活）恰恰也是阿伦特自己给这一著作的标题。因此，真正来说，《人的境况》和《心灵生活》这两本著作才构成了完整的“人的境况”。

一位非常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但同时她也是一位缺乏体系性的思想家。因此，人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对她及其思想加以理解和阐释<sup>①</sup>，而且只有通过不同人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理解和阐释，才能呈现一个更加真实的阿伦特，这也是阿伦特自身进行理解的路径。面对阿伦特一生的运思历程所涵盖的思想的丰富维度，我们在此一论文中选取其中一个角度对阿伦特进行阐释。然而，由于阿伦特的思想缺乏体系，因此，对她的论述需要我们作很大程度上的构建，这必然使得本文论述很难说完全符合阿伦特思想的本来面目，倒很有可能是一个勉为其难的误读。

## 2、国内外研究简评

据笔者所知，国内第一篇关于阿伦特思想的论文是张慎的《实践先于理论，行动先于思维——记杰出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哈娜·阿伦特》<sup>②</sup>，这是一篇对于阿伦特及其思想的介绍性文章。相对于阿伦特及其思想的深度和影响而言，这样的介绍性文字已经来得晚了。然而，从那时迄今这十余年时间里，关于阿伦特及其思想的文章依然寥寥，而论述阿伦特思想的专著，则只有台湾学者蔡英文的《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至于有深度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这一现状与阿伦特及其思想所占有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当然，近年来，人们对于阿伦特渐渐有所关注，目前，笔者已见到两篇关于阿伦特的博士论文（复旦大学哲学系潘非欧的博士论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陈伟的博士论文），而且从各个角度以阿伦特研究作研究生论文的也渐渐多了起来。不过，这些都只还处在一种“正在进行”的状态。下面，我从几个方面简单地综述一下目前国内学界关于阿伦特及其思想的研究状况：

第一，关于阿伦特的传记以及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就目前国内学界关于阿伦特的论述来看，这一部分最多，大陆所有关于阿伦特的专著（其实只有一本是以中文写作的，其余都是翻译过来的）都是传记性质的。此外，在关于阿伦特的论文中，大半也与这一方面相关。确实，国内学界是

<sup>①</sup> 接下来的一小节中，我们将对阿伦特研究的国内外现状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sup>②</sup> 张慎，“实践先于理论，行动先于思维——记杰出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哈娜·阿伦特”，载《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5、6期。

从海德格尔那里初次得悉阿伦特这个名字。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关系，如同海德格尔与纳粹的牵连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参与一样，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婚外恋情，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但是，阿伦特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和广泛影响力的思想家，过多地在这样的传记性质的研究上纠缠停留，显然有些本末倒置。比如，已翻译成中文的《阿伦特与海德格尔》（*Hannah Arendt / Martin Heidegger*）<sup>①</sup>，作者爱丁格（Elzbieta Ettinger）第一次根据原始材料描述了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这一婚外恋情，其中当然也论及了海德格尔与纳粹的牵连，以及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的痛苦友情。在这一著作中，爱丁格描述了海德格尔如何利用阿伦特并影响她的思想，以及阿伦特如何挣扎着原谅了海德格尔与纳粹的牵连。当然，爱丁格的这种描述带有过多的道德情感因素甚至偏见在内，并不为所有人赞同。比如，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说，这本书“包括了过于冗长的道德评论”，张祥龙则评论说“爱丁格的同情完全投入了感情”<sup>②</sup>。即使我们抛开这些评论不论，我们从中很难得悉阿伦特思想的轮廓，更不要说细致的论述了。因此，要了解并进一步地探究阿伦特的思想，长久地停留在这种论述上是远远不够的。类似这种传记性质的著作（包括翻译）还有《充满激情的思索：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sup>③</sup>。倒是另两本以传记的名义翻译过来的关于阿伦特的著作值得注意：《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和《汉娜·阿伦特》<sup>④</sup>。前者并不是什么传记，而是对阿伦特关于政治与历史和公民身份的思考的论述；后者虽是传记，但可以说是一本思想传记，能够给读者展现阿伦特思想的大概，尽管带有过多的文学色彩。

第二，关于极权主义以及公共领域的研究。阿伦特是以《极权主义的

① [美]阿丽斯贝塔·爱丁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戴晴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台湾则有苏友贞的译本：《女哲学家与她的情人》，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张祥龙：《海德格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③ 孙爱玲：《充满激情的思索：汉娜·阿伦特》，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德]阿洛伊斯·普林茨：《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焦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德]罗·科勒尔编：《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孙爱玲、赵薇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加拿大]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刘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法]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汉娜·阿伦特》，刘成富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起源》一书首次在政治思想领域崭露头角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著作奠定了她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因此，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是阿伦特研究的显见主题。从宽泛意义上来说，阿伦特在极权主义发生之后的所有思想，都是某种程度上对于极权主义现象所作的思考回应。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的衰落与极权主义的出现有重大关联。因此，从对极权主义和公共领域的分析入手来切入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国内学界在寥寥无几的论及阿伦特的论文中，在学理上从这方面论述阿伦特及其思想的占多数。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也只是停留在政治经验的描述层面上，还没有更深地切入到哲学反思的层面。另外，就是从阿伦特的《人的境况》这本著作中提出的行动理论出发的研究论文，但这些论文都显得单薄。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蔡英文的专著《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在这一著作中，蔡英文认为，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所关切的是人的实践及其展开的场域（公共空间）。书中论述了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反思、对政治哲学传统的批判、行动理论、公共领域、公共参与等主题，基本上勾勒了阿伦特的政治思想。

第三，关于真理与政治以及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晚年，阿伦特开始关心和探讨一些本属于哲学领域的问题。笔者以为，阿伦特对于哲学领域问题的论述也是出于其对政治的关注，但是她后期所涉及的论题确实是属于哲学领域，或者用阿伦特的话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哲学开始把目光转向政治领域，政治现象显然地成了哲学关注的领域，成了哲学问题。尤其是她晚期的著作，实际上是对政治经验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晶。当然，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在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中一直都存在着，然而阿伦特对于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新的理解和解释。与此相关的论文是近一两年来才开始关注的焦点，但也是屈指可数的两三篇论文。值得一提的是张汝伦《德国哲学十论》<sup>①</sup>一书中的“哲学、政治与判断”一文，文中揭示了阿伦特关于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内在冲突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调和的可能性，同时也指出了阿伦特在调和这两个方面时存在的逻辑

<sup>①</sup> 张汝伦：《德国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